

“我对他们是身体保健,他们对我是思想保健”

——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

□ 杨 娜

开栏的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外国知名人士来到中国后,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从理解到认可,从同情到支持,在强大力量的感召下,有的人留在了中国,有的

人为让外部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而呼号,有的人督促本国政府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本期开始,学习时报开设“被中国共产党感动的外国人”栏目,介绍他们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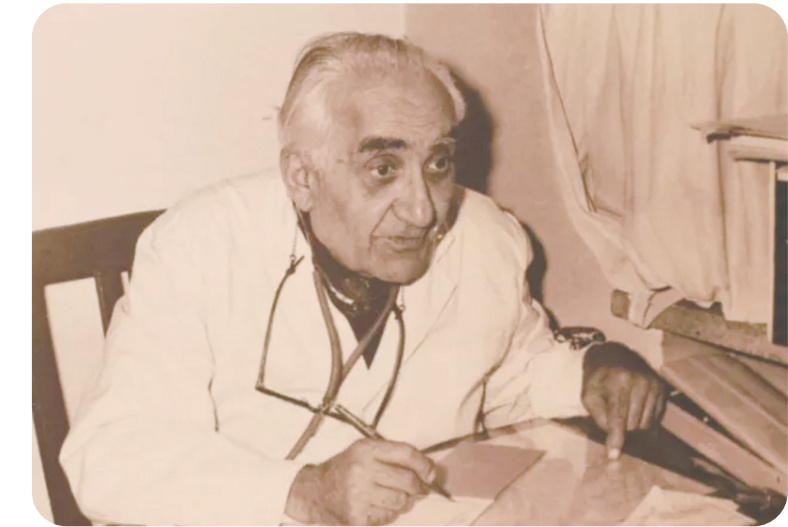
马海德是一位美国人,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1933年11月来到中国,原计划只停留一年时间,在上海做完热带病研究后就返回美国。但连马海德本人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他不仅没有返回美国,反而加入了中国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中国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有偶然,更有必然。

延安之行改变了马海德的人生轨迹

1910年9月26日,马海德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8岁那年,全家人都感染了严重的流感,一位善良的老医生为他们免费治病并留下食物,马海德一家才渡过了难关。马海德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医生,为穷人解除病痛。

1933年马海德在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上海,在九江路开了间诊所。马海德走进上海几十家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了解底层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深刻体会到旧社会的残酷,意识到唯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拯救更多的穷人。在上海期间,马海德结识了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进步人士,并经由他们介绍认识了宋庆龄。通过阅读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的革命与生活十分向往。

1936年春,中共中央希望邀请两位关注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到陕北苏区进行实地考察报道、帮助改善根据地的医疗条件。7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延安。在长达3个月的采访调研中,马海德亲眼看到陕甘宁苏区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缺医少药、物质贫乏,但党群关系良好、军民团结、战斗精神昂扬。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访谈,进一步加深了马海德对中国革命的去、现状的了解,增进了他对中共抗日救国等主张的认同。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是改变中国的真正力量。考察结



束后,马海德决定留下来并写出了《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毛泽东对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非常满意,任命马海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

马海德还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在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密切接触中,马海德的思想受到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感叹道:“我对他们是身体保健,他们对我是思想保健,还是我太幸运了。”作为随军医生,马海德在战场上亲眼看到将士们舍生忘死、英勇战斗。他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伟大事业所感动,更加坚信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就在这些怀抱坚定信念、不惜流血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马海德逐渐建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3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中国革命的外国旁观者转变为亲身参与者。

自觉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1936年8月,马海德在宁夏豫旺堡考察时,由于他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且经常为群众看病,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尊重。回民中有很多人姓“马”,为了更好地融入回民群众,他后来便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马海德。那时,马海德一边行医考察,一边帮助红军做群众工作,他积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欢迎回民群众当红军”等主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海德在战火中负责筹建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陕甘宁边区医院以及八路军军医院。他广泛争取国际援助、利用边区现有资源筹建八路军制药厂,想方设法缓解苏区医疗物资的紧缺状况。他还定期举办学习班培训医务人员,大大提高了对红军伤病员的救治能力。在他的努力下,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总计约1.18万张床位的医疗卫生网络。医疗救护能力的提升,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帮助、获得必要的物资支援,马海德帮助新华社成立了英文部,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敌后抗战中军民艰苦抗日的情况。他还每日用英文记录电台接收到的国际消息,再由新华社翻译成中文供毛泽东参考。马海德多次参与接待白求恩、柯棣华、米勒等外国医生援华医疗队,参与接待美军观察组以及外国记者等,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团三方,在北平组成了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海德名义上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军调

处的工作,实际上负责为备忘录的英文翻译文本进行把关。他还向美国代表团揭露国民党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介绍中共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作出的努力。黄华称马海德为“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对新中国卫生事业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百废待兴,马海德专门选择“中国最需要的、最麻烦的、最脏的、医生最不愿意去看的”性病和麻风病作为自己主要攻克领域。

为了消灭性病,他带领医疗队奔波各地,用了近10年时间,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的信息震惊全世界,马海德功不可没。

为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马海德积极奔走,共出访18次,几乎跑遍了全世界,为麻风病防治争取到更多资金和医疗设备。他与美、日以及欧洲国家联系,并请它们对口支援中国有麻风病防治任务的省区,提供交通工具、医疗器械及人员培训等援助。这种方法是马海德的创举,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马海德在中国共产党思想与事业的感召下,成了扎根中国的“最美奋斗者”。马海德是一位不计个人得失,努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1976年被确诊患上癌症,但他没有去休养,反而加紧推进工作,直到1988年去世。他的亲属说,“早年我们曾认为他的天地是在美国家乡,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如果当时他回了美国,他的思想、他的愿望和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汉代之前的东西交通

秦汉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就已广泛存在,早期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联系之空间幅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在周秦时期甚至更早,自陕西通向西方民间自发的、无组织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中原经过西北地区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当时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所以,这些情况没有被纳入国家的记录体系,在官方档案中少见反映,不被人们所广知。

正当中原政治史进入战国秦汉重要转折时期,匈奴作为北方草原强势军事实体,在冒顿单于时代进入空前强盛时期。冒顿不仅控制了匈奴各部族,并且施行对外扩张。匈奴在冒顿领导下征服了北方的浑廛、屈射、丁零、鬲昆、新犁等游牧和以射猎为生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冒顿东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又收复了秦始皇派蒙恬所夺匈奴旧地,成功地在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势力。匈奴在西向扩张过程中,制服了从楼兰到乌孙的西域大多数小国,势力急速自吉尔吉斯草原伸向威海、里海,并控制了东西文明地带间的交通,建立起世界史上空前辉煌的第一个游牧大帝国。

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为匈奴所阻隔,但匈奴与西域的“交通”则得以空前畅通,东西交通于是出现了新局面。因为匈奴较早控制了西域通路,匈奴军事强权对西域地方文化形态和文化方向产生了强劲的影响。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西域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在匈奴控制西域的形势下,当地商贸活动依然产生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匈奴支持和鼓励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方向。匈奴充当了汉族与羌族、乌桓族和西域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

匈奴东进不仅威胁到了游牧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等民族,其进一步南进还威胁到了秦汉帝国。秦朝面对匈奴的威胁采取武力进攻与修筑长城的双重策略来应对。经过休养生息的西汉为了抵御匈奴,需要联合处在匈奴高压统治下的诸游牧部族。与匈奴有世仇且被迫从河西走廊西遁、游牧于天山一带的大月氏是西汉首选的联合对象。汉武帝期待与大月氏采取联合行动,“断匈奴右臂”。张骞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使大月氏的。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冲过匈奴的重重拦截,西行越过葱岭,经过大宛(今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到达大月氏。由于大月氏西迁后已然安居,张骞交涉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得返回,途中不幸被匈奴捕获。一年后,张骞脱身归国,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历经13年艰辛回到汉朝的张骞,虽未带来与大月氏军事结盟的好消息,但是正因为这趟远程探索,张骞认识了西域,把意外所发现的西域诸国经济、政治、文化、地理、风俗等信息报告给汉武帝,尤其是西域诸多小国并非都如匈奴人般要骚扰劫掠汉朝,他们都仰慕汉朝,希望与汉朝往来交通。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张骞再次踏上出使西域的路程,此次出使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外交行为,而是包含了更实在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内容。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并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西使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西汉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丝绸之路的开通

□ 张连银 冯玉婷

安息、身毒、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伴,并派使者随行至长安,使者返回后,汉朝国富人众的事实西域传播,汉朝的威望在西域诸国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许多西域诸国的使者亦随行。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政治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多则一年之中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二三年到八九年。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不得要领”,但改变了汉朝与西域诸国双方的认识,尤其深化了西汉对西域的认识,从而激起了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兴趣。汉代在与西域的交往中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通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线。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后元元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相继设立了张掖郡、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河西四郡,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四郡、两关设置后,中原王朝的农耕文明犹如一把利剑,向西拓展到汉代的敦煌郡以西,河西走廊成为隔绝游牧民族的一条通道。汉朝建立军事城镇、烽燧、驿道、长城,将防御体系延伸到西域,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汉朝的影响力远及中亚一带。汉朝与西域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保障。汉朝通过贯通西域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叫作“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

张骞出使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贸易联系广泛存在。但就当时的基本情况而言,隔绝性毕竟是主要的,张骞出使之后,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才进入新的时代,所以张骞出使才被称作“凿空”。张骞出使西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张骞出使西域原本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

□ 曲晓霜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承前启后的枢纽,其务实进取的时代风貌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事”追求

作为基本的行为记录单位,“事”在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周家台秦简《日书》的繁行篇中不仅列有行事、请谒事、忧病事、家室事、赏赐事、狱讼事、分褐事、钱财事、变治事,更概括出了急相穷事、恶事、故事、末事、善事、凶事、吉事等类。可见所行之“事”或有具体指向,或是抽象集合。前者与官方行政息息相关,如居延汉简中所谓“一事一封”,即体现出文书传递过程中对时效性的追求。后者则多见于民间的择日活动中。而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阴阳杂篇中,有“得天者贵,得地者富,得游变者其为事成”之句,更体现出时人在富贵追求之外对“成事”的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所行之“事”中还有“大事”。先秦时期多以国家为讨论对象,行事往往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东汉郑玄注曰:“大事谓丧戎。”足见时人在祭祀、战争之外重视死丧的观念。还有崇文之风气,《后汉书·应劭传》载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以使“国

之大事,莫尚载籍”。此后行政运作日益规范,人才需求也与日俱增,唐孔颖达为《尚书》中“立政”作疏时说:“王之大事在于任贤使能。”然而“大事”在统治者视角之外尚有民间视角。《礼记·月令》以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便是百姓利益的考量。《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为吏时“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向之”,亦是与日常民生相关之事。

至于出土文献中的“大事”则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泛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之事,如婚姻与礼仪,往往与“小事”相对,即所谓“小事果成,大事有庆,它事毋小大尽吉”。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便将“毋喜细说”与“毋犯大事”相对,体现出这种正反之分的思路。二是实有所指,即需要聚众出击的兵役之事。孔颖达曰:“大事谓兴役动众,必须大同之世方可为之;小事谓饮食衣服,不待众力。”也许正因兵役劳民伤财,往往导致百姓不堪重负以致生乱,故“大事”也发展出拥兵反叛之意。

“有为”心态

立足于“成事”追求,秦汉时期形成了“有为”心态。

其实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有为”与“无为”的论战。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使寻求政治秩序之重建

成为诸子立说的基本用意,而君主在国家治乱中起决定性作用,故为君之道即君主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规范便成为百家争论的重点。其中儒家是有为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从德政与礼治的角度来指导君主之行为。而无为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上古先民在原始文明下敬畏、依赖及顺从自然的心理与行为,随着政治文明的深入,无为思想最易在时代动荡之际滋生,如道家中的老子,将“无为”视作宇宙、社会、人生的普遍原则,其深层用意在于制止君主的暴政、乱政。然而随着道家学派的不断发展,亦产生了“无为而无不为”之说,清静无为之思想逐渐转变为积极进取之观念。在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剧变中,这种转变不仅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反映出道家理论的活力所在。

及至秦汉时期,“无为而治”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国法家韩非之“虚静无为”,到西汉初年黄老之“清静无为”,再到武帝时期董仲舒之“寂寞无为”,法、道、儒三家在君道的选择上存在着共识。西汉统治者起于道家思想盛行之楚地,又深戒于秦之敝,既有思想渊源又得现实制约,故“文景之治”时,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务”。

汉文帝时,贾谊将儒家思想之精

髓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结合而成治安之策,用礼制推行仁政,并以法制为必要补充,倡导人为而维护巩固君权,更批驳时事曰:“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汉景帝时则力促经济恢复与吏治整顿,并得晁错进言而行削藩之策。虽贾谊贬于长沙郁郁而终,七国乱起晁错身死,但均不可谓是无所思与无所为。及至汉武帝时内弱诸侯而外御匈奴,种种“有为”之事,将国势推向巅峰,多为后继者所推崇。东汉陈蕃更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而在民间活动中,则常见“有为也,吉”“有为也,美恶自成”等记载。可见秦汉时期虽然看似“无为而治”,但其中却蕴含着有为思想与实践,符合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社会中普遍流行着“成事”追求与“有为”心态,反映出时代变迁中大一统王朝形成之际的现实需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正所谓“居有食,行有得”。普通百姓日常活动中的真实诉求,往往就是我们窥视一个时代整体风貌的有力参照。

